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知識份子

1987年《夏季號》

\$4.00



經濟	論股票市場中的反身性	索羅斯	3
	論企業跨地區橫向聯合	王維鋒	11
	企業：日本技術發展的中堅	馮昭奎	14
社會文化	孤獨地在一起：非浪漫的一代	維伯	18
政治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問題	楊百揆	22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回顧	唐文芳	26
	中國現代諮詢事業的基本特徵	沈峻坡	35
	契約、政治權威以及道德原則 ——傳統的契約論與洛爾斯的契約論	石元康	38
	美國合法反對黨制的起源	王希	45
專欄	美國美國	余剛	51
	大眾傳播	姜敬寬	53
	政治學漫談	水東和	57
文學藝術	她穿了一件水紅色的衣服 ——溫州街的故事	李渝	61
	詩歌六首	楊煉	70
	動物農場	奧威爾	72
	面對生存：困境和出路 ——由一匹“黑馬”說開去	唐曉渡 楊煉	95
	重評“雙百”方針	李基凱	107
歷史	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	吳欣	115
哲學與思潮	詮釋學與馬克思主義 ——保羅·呂克訪問錄	林鎮國	123
	書評 大書小談	夏竹麗	127

本刊發表的文章均為作者個人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編輯部和顧問委員會的意見。本刊文字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回顧

●唐文方

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兩大任務是消滅貧富差別和迅速發展經濟。在社會主義政權建立的初期，由於起點較低，社會主義高度集中的生產與分配制度有利於對勞力、資源的調撥及物質財富的統一分配，從而使國民經濟得到較為迅速的發展及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相應地，經濟發展與分配平等要靠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及半動員、半強迫式的群眾性政治參與來實現。然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勞動分工的逐漸複雜化，平等與效率越來越成為兩個不能相容的概念。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及政治上的控制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群眾政治熱情的喪失、生產效率的下降和浪費。面對這種局面，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不得不在平等與效率及政治控制與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之間做出選擇。

本文試以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來說明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上述問題。中國在追求平等和相應的政治控制這一極端、以及效率和相應的權力下放的另一極端上，比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走得更遠。因此，中國的經驗值得深入研究。

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消滅了貧富差別並取得了經濟平等？現行的經濟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要付出什麼代價？在不同發展階段上，政治控制與政治參與以什麼樣的形式體現出來？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做一初步討論。

平等的得失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基本任務是改變舊

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和貧富懸殊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為所有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並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質需要。從工資政策和教育政策來看，中國在建立社會平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首先，中國在消滅工資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到五十年代末，工業生產中大大限制了計件工資。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間，經理人員的季節獎金被取消，高級軍官的工資被削減。¹文化革命期間，中國又取消了全部計件工資及物質獎勵和獎金，並決定停止對以前的工商資本家償付利息。中等水平以上工資收入的增長被凍結。低工資的增長不是根據勞動表現，而是人人有份。結果，中國在消滅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其它發展中國家。數字表明，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收入的不平等程度（gini coefficient = .25）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gini coefficient = .43）。中國城市家庭中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四十之所得在城市家庭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為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其它二十四個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最窮的百分之四十城市人口的收入平均只佔城市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²

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在消滅城市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成績也是突出的。一九七〇年左右，在蘇聯、羅馬尼亞和其它四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高收入與低收入的平均差別為二·七倍。而在中國，這個差別只有二·三倍。³此外，由於住房補貼、免費教育、公費醫療，及對糧、油、棉等基本生活物品的人均分配，高收入家庭只能把錢花在價格很高的額外消費品上。因此，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高工資

在中國並不一定意味高水平的生活條件。

在教育領域中，不平等的現象也得到緩解。基本教育在過去三十年中迅速普及。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高度平均主義式的教育在城市和農村發展很快。學制縮短了，教學內容被精簡，政治教育加強，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城鄉教育經費分配的差距縮小。許多過去被排斥在教育大門之外的人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城鄉成人平均文盲率為百分之三十，大大低於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數（百分之六十二）。*

教育平等同時還反映在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程度的影響趨於減弱。七十年代，九年制教育在出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中都迅速普及。工人、農民及其它“紅五類”家庭的子女可以很順利地取得畢業文憑。知識份子和幹部子女的教育程度仍然略高於其他人，但資本家子女却失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優勢。* 總之，家庭對子女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的影響相對減弱。一九六七年以後，父親受過良好教育並不意味子女能受到良好教育並找到好工作。教育普及的政策有效地打破了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階層的劃分（見表一）。

表一· 父親教育、職業與子女教育、職業和收入之間的回歸相關係數

子女	父 親	
	教育	職業
教育		
一九六六年前	.22	.46
一九六七年後	.05	.00
職業		
一九六六年前	.41	.29
一九六七年前	-.20	-.16
收入		
一九六六年前	-.28	.03
一九六七年後	.05	-.07

資料來源：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52, Table 5 (子女的年齡、性別、教育和職業在相應的地方均作為控制變量)。

此外，在其它方面，諸如醫療保險，群眾性防治病制度，勞動保護及退休金制度，就業保障，地區工資補貼等等，中國也相當成功地減少了以前的不平等狀況。饑餓、乞討、吸毒、賣淫、及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基本上被控制住或在程度上大大減輕。文化革命平均主義政策的高峰時期，中國在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大超過其它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

然而，要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就必須先建立起一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生產品種指標必須由國家下達；商品與貨幣的關係被降到最低限度；國家計劃之外的市場貿易受到限制甚至被取締；生產資料由國家直接調撥；工資由政府統一

平均分配。在工廠中，精神獎勵取代了物質獎勵。工人不是為個人或家庭的利益，而應當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文化革命中取消物質獎勵後，每個工人每月領取同樣數目的工資補貼。一九六三到一九八一年的十八年間，沒有過任何基於工作表現的工資調整。* 當利潤、競爭、物質刺激等等市場機制被純粹的精神鼓勵所取代時，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也同時被取代。個人努力與集體努力之間的連結及個人收入與集體收入之間的連結被割斷。

有的學者認為，基於個人利益的理性選擇並不一定是經濟學中最理想的假說。在生產過程中，責任感和道義感是工作動機的中心問題。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常常不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例如，在接受“囚犯的選擇”(Prisoners' Dilemma)實驗時，人們常常做出非自私的決定。* 中國的經驗證明，人們在某些時候可以為一種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而工作。但是，他們只有在得到許諾，相信以後的生活會變得更好，才會暫時放棄眼前的利益。當這種許諾落空時，人們會變得對精神刺激不敏感，更加計較物質利益的得失。

由於多幹少幹都不會影響收入，工人即沒有通過努力工作增加收入的內在動機，又沒有與其他人競爭的外部壓力。他們沒有主動性和熱情性去增加生產、革新技術、降低消耗、提高質量及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由於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指標是衡量工作成就的主要尺度，企業常常把設備、材料和人員的需求量提得很高，而把生產能力報得很低。不可避免地，生產效率下降，消耗上升。例如，雖然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間國營企業總產值增加了百分之十點八，但固定資產投資在同一時期內却增加了百分之十點九，而勞動生產率只增加了百分之三點九。* 如表二所示，在國營企業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所實現的利潤從一九五七年的一三九元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九六點一元；集體企業從一九五七年的三百四十元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二百卅四點三元。

表二· 每百元固定資產所實現的利潤

	1952	1957	1965	1978	1980	1982	1983	1984
國營企業	134	139	98	103	101	95	95.1	96.1
集體企業		340		273.2	255	216	214.9	234.3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鑑，一九八五》，經濟管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北京版）：III-28，一九八二年國營企業數字及一九八〇年集體企業數字摘自《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五，三七五~三八一。

在農村，集體化農業的建立加強了生產隊和大隊中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雖然農民的收入是按工分計算，但口糧的分配却按人頭算。也就是說，不管付出的勞動多少，生產隊的每一個成員都有權利分得同樣數量的糧食，即便是家庭收入不夠用來交糧食錢。這種糧食分配制度在一些生產隊中導

致許多“超支戶”的出現。勞力少或幹得少的同樣可以生活下去，而勞力強或幹得多的却富不起來。因此，至少是在糧食分配問題上，勞動與報酬之間並沒有很強的聯系。另外，家庭副業受到嚴格限制。自留地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影響農民全心全意地幹社會主義，因此，被限制在最低限度。過去是農民主要收入來源的農貿市場和集市在文化革命中不是被禁止，就是在數量上減少。最後，更重要的可能是宏觀農業政策中出現的問題：農產品價格被壓在工業產品價格之下，從而導致城鄉價格剪刀差；農村剩餘勞動力無法輸出，生產隊不得不使用計時工分，使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這使得農民平均收入下降；為了加強糧食產量，國家命令在長江流域和四川地區實行一年三季作物，導致生產費用的增加；糧食第一的政策迫使農民不得不在自然條件不適合的地方種谷物，例如在山東產棉地區及西北牧區種糧食。結果，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國成為黃豆和棉花的進口國，¹¹ 一九七七年人均糧食產量與一九五五年相同。¹²

總之，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解決了許多在市場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中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貧富懸殊，階級分化，通貨膨脹，失業，貧民窟，以及政府在“消費者主權”¹³的狀態下無法預測和控制生產者的行為等等。然而，在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失去了市場經濟中的許多有利因素。平均主義的政策及計劃經濟導致政治控制的加強、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效率減低，生產率和收入都保持在低水平上。“我們不可能同時取得市場經濟的效率和社會主義的平等。”¹⁴ 因此，平等必須付出代價：大家只好一樣窮。

經濟增長的得失

面對人民不斷增加的不滿情緒和經濟結構的失效，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宣佈，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黨的工作重心應當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轉移，要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努力。

相應地，人們開始認識和解決計劃經濟中的一些問題，例如權力過於集中，計劃定得太死等等。市場運作被認為是計劃經濟的補充形式。價格、信貸和其它市場機制被有選擇地用來促進經濟增長。農村中出現了專業戶和家庭承包制。城市企業在人員調撥、投資和生產中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可以直接與外國資本建立聯系，特別是經濟特區的企業。總之，部分經濟決策權從中央下放到省、市、企業。這一政策的實施又相應地要求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做出進一步調整，包括優先生產消費品、企業中的黨政分工和發展經濟法規等等。

改革政策帶來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四年間，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等經濟指標的增長速度均超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六年間的任何一個時期。¹⁵ 一九八四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九點一，超過了十二大規定的百分之七點二的目標。¹⁶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四年間，國民收入增長百分之九點二，為世界第一，¹⁷ 這個數字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是最高的（見表三）。

表三·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¹⁸增長率比較

國家	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平均年增長率(百分數)
中國	9.2
蘇聯	3.5
東德	4.4
捷克	1.4
波蘭	-2.3
匈牙利	2.3
羅馬尼亞	4.0
保加利亞	4.2
南斯拉夫	0.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六三三。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一再強調放慢固定資產投資速度。¹⁹ 企業不能光靠添置新設備和廠房來擴大生產，而應當在原有廠房、設備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效益。從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開始，企業勞動合同工制度代替了終身制，企業有權根據自己的需要決定用人的標準。一九八六年底，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國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²⁰ 規定企業應對生產中的虧損負責，國家將逐步取消對虧損企業的補貼。瀋陽防爆器械廠由於管理不善，連年虧損而宣告破產就是一個例子。²¹ 再者，國營企業的工人可以在本企業中購買股份，從而加強了他們對企業的責任感。²² 根據《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的說法，股份化就是馬克思所指的“共有個”。²³ 最後，一九八六年下半年的一段時間內，國內對於提高效率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一個科學的、民主的決策結構應當取代現有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官僚體制。²⁴

與此同時，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國家還調整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從而改變了斯大林經濟模式中高積累、低消費的狀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大幅度提高。預算中工資、福利和獎金的比例增加。消費資金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五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六十八點八，而積累資金則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五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二。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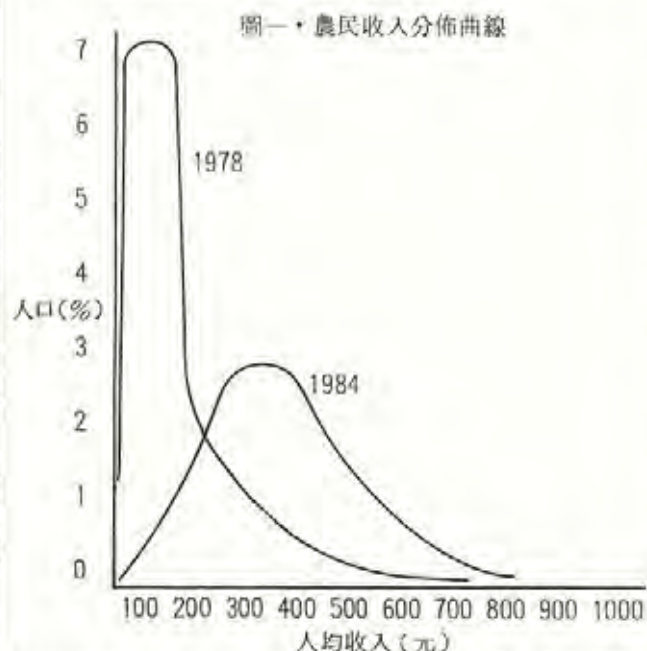
由於積累消費關係的調整及效率和市場機制的強調，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間分別增長了百分之八點二和百分之十五。²⁶ 工人收入及其消費的增長使企業內的觀念開始變化。增長率取代了平均主義的原則，成為衡量政策成敗的尺度。技術發明者只要能帶來有利的經濟效果就行，不管他們的行為是否越出常軌。另外，考慮個人利益一度被認為是合理的，只要同時兼顧社會利益。²⁷ 這意味着生產者可以對自己所冒的風險和得失做出獨立的決定。結果，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提高，工業生產迅速發展，勞

動生產率改善，工資、獎金和就業機會都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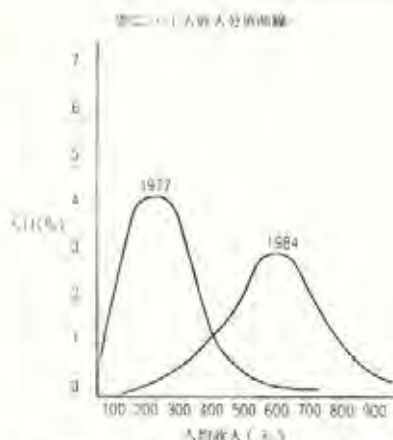
農民收入及其消費水平的提高是由於責任制的實行，政府對農村企業的鼓勵，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農貿市場的擴大和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民可以根據市場的需要以及與其他生產者競爭的可能性等因素在生產中做出自己的決定。由於政府鼓勵農民在滿足自己需要之外發展商品生產，農副產品商品率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間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五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三。²⁸ 商品生產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²⁹ 因此，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了，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

然而，有得亦有失。“效率的提高是以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為代價的……這種不平等起源於市場機制的運用。”³⁰ 根據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程瑞的估計，貧富分化在中國不太可能成爲一個問題。他認為，雖然農民家庭中高收入的百分比增加了，但與此同時低收入家庭的百分比也相應地減少。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進入中等以上收入的行列。同樣，城市家庭中高收入的比例的確增加了，但低收入家庭也同時減少。在今天的中國，“窮的變富，富的更富”。例如，一九八四年農民收入的基尼相關系數爲 .264，比一九七八年的 .237 略有提高，但仍然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低。³¹ 工人家庭收入一九八四年的基尼系數爲 .168，低於一九七七年的 .183，也是世界上最底的國家之一。³²

平等與否，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平等這一概念。對於一些中外社會科學家來說，用基尼系數或勞倫斯曲線 (Lorenz Curve) 等統計工具來衡量，抽象數學意義上的平等在中國並不難取得。³³ 然而，基尼系數中所反映的平等有時不能令人滿意。這種平等常常並不意味着社會正義的實現。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收入分佈曲線 (見圖一和圖二)，不平等的問題就變得非常明顯，特別是在農村。



資料來源：《遠望》，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第十五期。



資料來源：Li Chengrui, "Economic Reform Brings Better Life," *Beijing Review*, 28:29 (July 22, 1985):21

如圖一和圖二所示，一九八四年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比一九七八年大得多。這個傾向在農村特別明顯。一九七八年時，百分之九十五農民的收入集中在一個很窄的範圍內 (三百元以下)。到一九八四年，收入分佈曲線變得較以前平滑，說明農村人口中的收入差距被拉大。這種傾向在城市也同樣存在。

雖然從基尼系數上看，城市收入趨向於更加平等，但全國所有大小城市加在一起的平均數字並不能真正說明問題。³⁴ 一種可能性是，大城市中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小城鎮中的企業發展很快，使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從而拉平了全國城市的平均數字。同樣，在農村，地區間的不平等幾乎沒有增加，部分原因是過去最窮的地區近年來發展較快。但是，地方性的不平等却有所加劇。例如，有些“專業戶”的收入大大超過了同一村子裏的其他農民。

事實上，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人們已經可以看到貧富之間的差別。高收入階層包括城市的個體戶和農村的專業戶。低收入階層主要包括勞動力不足，生產資料不足及缺乏技術的農民家庭和城市中沒有“門路”的工人家庭。據報導，自從人民公社被取消後，有些農村家庭的收入實際上下降了。從數字上看，一九八四年農村高低收入之差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零點七倍。³⁵ 城市中，各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明顯加大。例如，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國營企業工人的平均月工資爲一〇二點五元，而行政幹部的月平均工資只有九十七元。³⁶

教育方面，文化革命中的平均主義政策幾乎全都被否定。學生不分質量高低一律就近入學的政策被學校按質量高低排列的等級制取代。進什麼學校根據學生在考試中取得的分數而定。“重點學校”在師資和財政上都受到優先考慮，錄取的學生也是入學考試中成績最好的。高中生畢業後不必再下鄉，只要考試成績好，就可以直接上大學，而且畢業後還能分到一份好工作。如果家庭經濟條件好，父母又有文化，子女就能受到更好的訓練，上好學校。家庭背景對子女所取得成就的影響又開始加強了。事實上，最好的學校中，知識份子和幹部子女的数量越來越多。³⁷

此外，由於農村家庭承包制的實行，有些父母爲保證家

庭勞動力的需要，不願讓子女去念書。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二年間，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下降。適齡中學生的入學率由以前的百分之四十六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數字為百分之三十九。³⁸ 入學率的下降在入學率本來已經很低的地區尤為明顯，而且在女性中更加明顯。

總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中國成為共產黨國家中從左傾意識形態向市場社會主義走得最快的國家。”³⁹ 結果是迅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較明顯的改善。然而，不平等和分化的傾向也開始冒頭。對開放和市場機制的強調導致了收入分佈的不均和對平等機會的不平等享有，至少在教育領域內是如此。⁴⁰ 在左傾政策時期，不等的取得是以低效率和低生活水平為代價的。而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效率的提高則是以不平等的加劇為代價的。和匈牙利的改革者一樣，中國領導人也同樣面臨平等和效率的選擇，或如科爾內（Kornai）所說，面臨着“效益和社會主義道德”之間的選擇。⁴¹

平等和政治參與形式的變化

一九七八年以前，政治參與的形式表現為群眾運動，或稱“動員式參與”。這種參與形式和杭廷頓（Huntington）和科華塞爾（Kornhauser）所謂“群眾社會”的情形相似。按照杭廷頓的說法，⁴² 非正規性、不定期性、能量巨大和多樣化是群眾社會政治參與的基本特徵。暴力與非暴力相結合，合法手段與非法手段相結合，以及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群眾性運動是群眾社會政治參與的獨特形式。群眾社會缺乏能夠把民衆的政治願望和行動與政治領導人的目標和決定連接起來的中介政治組織形式。結果，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存在着一種直接的關係。用科華塞爾的話來說，群眾可以隨時被領導者動員起來，領導者可以隨時被群眾所影響。⁴³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中國領導人曾直接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向民衆傳達政治精神，獲得群眾對政策的支持，或動員地方按照中央的計劃行動。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問題是建立一個包括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的政治聯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一小撮敵人。毛澤東曾為“絕大多數人”在數量上下過定義：

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份子，愛國知識份子，愛國資本家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加在一起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這些人屬於人民的範疇……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是地、富、反、壞、右……這些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四或五。⁴⁴

在一個平均主義社會中，領導者能夠動員起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直接參與政治運動，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能夠取得最大限度的平等和最低限度的經濟利益分化。如圖一所示，到一九七八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農民的年收入在三百元以下。這種經濟利益的一致性為政治領導人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例如：土改、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並達到最大限度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機會。物質分配的平均主義形式是烏托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這種平均主義的形

式反過來為社會主義群眾性政治參與提供了經濟上的牽制作用。

在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參與問題時，杭廷頓提出了一個“民衆模式”。⁴⁵ 根據這個模式，以平等為目標的群眾性政治參與將導致一個惡性循環。高強度的政治參與和政府增加福利和平等的政策導致低效率及經濟增長緩慢。由於越來越多的團體參與政治並試圖在停滯不前或增長緩慢的經濟中獲得自己的一份利益，社會矛盾和社會分化加劇，結果會造成社會動亂。

然而，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杭廷頓這種模式不一定能循環得通。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及中央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這個體制又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的保護。如舒蒙伯特（Schumpeter）所說，“有效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是通過專無產階級的政，而不是由無產階級來專政而實現的。”⁴⁶ 在這種體制下，政治參與並不一定導致利益集團的增加或矛盾的加劇。社會分化也不可能出現。經濟利益的平均分享更有可能導致異化和政治參與的減少，而不是內亂。政治動員越來越成為實現群眾性政治參與及貫徹政府政策的重要手段。至少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到一九八四年，如前面圖一和圖二所示，城鄉人口中的收入分佈出現了更大的不平等。中國報紙上已經開始報導貧富之間矛盾的加劇以及持絕對平均主義態度的人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政策的不滿。⁴⁷ 在農村，有些“萬元戶”被迫為本村購買價格昂貴的物品。各種“稅收”名目繁多。有時他們的財產被人破壞。地方黨的領導人甚至撕毀已經簽定的合同。⁴⁸ 在城市，國家機關的幹部和知識份子抱怨其他行業（如工人、個體戶等等）收入增加過快，而他們自己的收入則相對下降。⁴⁹ 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仍然缺乏一個致富的合法途徑。文化大革命以後，雖然個人能力及學歷在理論上又成為用人優先考慮的條件，但實際上仍有不少人濫用職權或通過個人關係來謀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一份調查表明，城市居民中過半數以上的人認為經濟改革並沒有給每個人帶來平等的機會。⁵⁰

此外，“市場經濟的優越在於……允許多樣化的存在。”

⁵¹ 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出現了許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團體，或是已經存在的團體重新活躍起來，例如作家協會，婦聯，政協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專業人員，學術界，消費者，甚至集郵愛好者在全國、省、或市的範圍內成立了自己的團體（例如企業家俱樂部，學術沙龍等等），召開會議，出版自己的刊物。⁵² 一個例子是消費者協會的成立。到一九八六年，各省已經成立了一百四十八個消費者協會。⁵³ 消費者對生產過程的控制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加強，生產單位不能單純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指標而生產。阿萊·挪夫（Alec Nove）寫道：“通過購買者的行為來影響生產，的確是把權力下放到消費者的真正民主的方式。”⁵⁴ 雖然中國還沒有達到通過市場控制生產，但挪夫這句話却點出了消費者協會的實質意義。另一個例子是中國政治學協會的成立

。政治學協會一九五二年被取消，一九八〇年重新成立。到一九八四年，中國政治學協會已經有會員一千人，十一個地方協會，一個研究所，兩份刊物。⁵⁵

此外，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說明，專業社團的興起，標誌着生產與服務中的專業化與效率的增強。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又為專業技術人員提高自己的地位提供了一條“合法”的途徑。⁵⁶ 在現代化社會中，專業團體試圖通過控制技術服務市場來獲得某種特權。對技術市場的控制又要求對技能的壟斷。技術人員之所以能夠合法地獲得這種壟斷的特權，是因為掌握技能需要受教育和個人的努力，而受教育的機會和個人努力的程度對每個人來說是平等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參加考試，每個人都可以勤奮）。然而，機會平等會導致後果的不平等。雖然受教育的機會平等，但每個人的能力和背景不同。因此，能力強、背景好的有機會受到更好的教育，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拉爾森（Larson）所說，由於職業與學歷緊密聯系在一起，專業技術的掌握及量材用人的原則實際上大大加強了社會的不平等狀態。⁵⁷

最後，專業團體在發展的同時還獲得了更多的獨立性。專業人員透過教育壟斷專業知識，從而享有特權。當專業知識在一個社會的運做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時，專業技術人員所扮演的角色也隨之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平等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收入上，而是反映在技術人員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智力資源來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更有利於自己的決策，或更多的預算。這種情況在六十年代的蘇聯發生過。當時，雖然技術人員的工資被削減，但由於權力下放，他們却變得更加獨立自治。⁵⁸

平等形式的變化及社會利益多樣化的出現同時也反映在群眾政治態度的轉變上。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再像激進年代中那樣被用來作為政策實施的有效工具。例如，一九八四年初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及一九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沒有形成群眾性的運動。部分原因是人們對政治運動已經厭倦，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群眾利益的多樣化打破了過去那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眾”的狀況，領導人認識到像過去那樣的搞法已經行不通了。政治參與的形式在中國開始發生變化。

按照杭廷頓的說法，在以發展為目標的國家中，政治參與的形式可以用“技術官僚模式”來描述。⁵⁹ 這個模式的特點是政治參與的下降，高速度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杭廷頓認為，為了確保經濟發展，政治參與至少應當暫時保持在低水平。另外，經濟發展必然帶來至少是暫時的收入不平等。貧富差別的加大和政府對政治參與的鎮壓會使社會關係緊張化，最終導致一個“爆炸式參與。”現存的政治體制會被推翻，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會被改變。因此，低參與——經濟增長——不平等——鎮壓構成了另一個惡性循環。這個循環只能用“爆炸式參與”來打破。

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杭廷頓的技術官僚模式顯得過於簡

單化。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在某些方面的民主性政治參與加強了，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減少了。

一方面，民主性政治參與較以前加強。個人與社會團體有更大的權力來決定自己的事務。他們的直接利益與自發的要求得到更多的滿足。近幾年來期刊、報紙、書籍及內部出版物數量與種類的大幅度增加說明多種政治傾向的存在，⁶⁰ 并且能通過出版物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得到加強，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過程變得更正規化。地方選舉中開始實行差額制，⁶¹ 使得政治競爭趨向於公開化、合法化。在制定某些政策的過程中，提案開始來自各動不同渠道。決定的作出常常建立在妥協和綜合各種不同意見的基礎上。例如，一九八六年春季，一些科學家發表文章，認為國務院制定并即將上馬的三峽水力工程計劃在技術上有問題。⁶² 結果，國務院不得不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重新審查該計劃的可行性。⁶³ 因此，多元化的政治趨勢帶來了更多的民主政治參與。

但是，民主政治參與在另一些方面又受到明顯的限制。雖然黨的權力受到黨政分工的某種箝制，但中國仍不存在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和有效的政治機構從外部來制約共產黨的作用。黨仍不允許脫離黨的路線的不同意見和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存在。一旦黨在某項問題上做出了決定，就不可能再對這個問題提出異議。⁶⁴ 八〇年初，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憲法中關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的條文。一九八一年初，共產黨查禁了非官方期刊雜誌。八四年初，共產黨（至少是黨內的一些人）試圖發起一個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八七年初，三個對黨“出言不遜”的知識份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撤消職務并開除出黨。接着，胡耀邦由於“背離黨的原則”而被撤消其總書記職務。中國又開始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加強黨的領導。總之，杭廷頓所謂經濟發展導致低參與的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社會科學家們對這種一個體制中兩種傾向并存的局面做出過解釋。如果一個制度的“不確定性”很高，就會出現權力集中的傾向。⁶⁵ 然而，當這個體制所要完成的任務越來越多，在組織上變得越來越複雜時，專業化程度會相應地提高，從而要求政治權力的分散。⁶⁶ 在這種情況下，專業人員會有更多的發言權，政治參與變得更加民主。⁶⁷

任何政治制度中的領導人都會維護自己的地位。出於切身利益考慮，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去保持一個制度的連續性。當一個問題的“不確定性”威脅到制度本身的安全時，政治控制就會加強。但是，政治控制不僅需要強行實施，而且會導致僵化，低效率和缺乏主動性。

如果“不確定性”牽涉到完成某項任務（task-performance），而不是政權本身生存（system maintenance）的問題，對政治領導人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權力下放。對於執行某項任務的人（這些人同時也是最有專業知識的人）來說，對信息交流和行動有更多的自由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和主動性。而且，工作性質的複雜化與專業化限制了領導人對信息的掌握（“不確定性”增加）。某些個人和團體甚至會故意

截留信息或故意造成技術性困難，從而加強自己在機構中或社會中的地位。⁶⁸ 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複雜性使下層能夠對上層施加壓力，政治領導人不得不下放權力。總之，領導人的目的是使某項任務得到圓滿完成，專業人員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獨立性、地位及預算等等。結果，後者獲得更多的參與權。

在中國，過去激進的經濟政策無法實現高效率的生產及滿足人民更高的物質欲望。當人民有可能向政權提出更多要求時，過去經濟政策中的某些失誤成爲現在維護政權合法性所要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當完成任務的不確定性與政權存亡的不確定性結合在一起時，權力下放與加強控制并存的局面就不足爲奇了。

因此，真正的困難存在於中國領導人求生存和發展并進的戰略。而爲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黨的領導的合法性又建立在能否加速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爲了有效地發展經濟和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又要下放權力，改善生產效率。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團體和個人獲利多，另一些獲利少，社會矛盾變得更加複雜。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的不斷複雜化，具有專門知識的技術人員對信息產生了壟斷權，迫使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不得不考慮技術人員的意見。但是，技術人員或科學家過多地參與決策會使領導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因而使政權本身的“不確定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又會出現加強政治控制的局面。因此，如何保持現有的經濟增長并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保證任務的執行），而又使不同社會利益集團參與決策的程度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維護制度的生存），這是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新任務。

事實上，目前經濟改革中所要建立的決策結構，目的就是要同時應付執行任務和制度生存兩方面的“不確定性”。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爲，⁶⁹ 爲了確保經濟的協調發展，應當建立一個包括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內的多層次決策體制。國家對宏觀經濟活動做出統一安排，諸如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企業在國家統一政策法令的框架下對某些事情可以做出獨立的決定，例如生產、供應、銷售、人員、財政，設備改造和更新，以及對本單位擁有資金的使用等等。個人應當有更多的自由來選擇自己的職業。應當允許工人及企業的其他人員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當宏觀經濟活動與微觀經濟活動發生衝突，當企業根據市場訊息制定的政策決定與國家經濟計劃中的要求不符時，企業的微觀經濟決策應當服從於國家的宏觀決策。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現有的工業決策體制影響到政治參與和政治控制的形式（見圖三）。

圖三中，控制和參與大致可以分爲五個層次。權力核心是最高決策機構，包括政治局、書記處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單位包括國務院及所屬各部，黨代會及黨中央所屬各部、軍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婦聯、工會、及全國性專業團體，例如作家協會等等。地方單位包括各省、市政府，黨委及下屬各部，地方性群眾組織，諸如消費者協會。企業包括全民和集體企業。最底層是工人。

圖三·政治控制和參與



在控制一邊，政治控制的強度自上而下逐漸減弱。權力核心直接控制中央單位領導人的任免，特別是軍隊、黨政各部委、人大和政協的領導人。這些單位的職能也由權力核心來劃定，例如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能由指令性計劃轉向指導性計劃。

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略有放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在一定程度內根據自己的條件和需要做出經濟決定。國家下達的計劃帶有更多的指導性，不再完全是定死的指標和行政性命令。雖然來自上面的控制沒有消失，但地方可以成立某些利益集團，例如消費者協會。

地方一級對企業的控制進一步減弱。根據第七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一九九〇），縱向聯合應當被橫向合作所取代。企業可以通過談判與供應單位和消費單位訂立合同，達成協議。⁷⁰ 一個指導性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可能會形成。新的稅收制度取代了以前國營企業同時上繳所得稅和利潤的做法。政府部門和地方當局對企業日常運轉的行政性干涉減少了。企業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并在不同程度上對本企業的盈虧負責。經理和廠長可以在生產中做出更加獨立的決定。

最後，個人在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大大增加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個人利益受市場機制的控制。人事方面實行了勞動合同制。根據能力和表現用人的方針又被重新強調。工人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己選擇職業，工作分配中的行政控制也相應減少了。

在政治參與方面，機構化的參與自下而上逐漸加強。在個人的層面上，工人在企業管理中有更多的民主參與權，或如弗里德曼（Friedman）所說的“直接參與”。⁷¹ 企業中的管理人員不少是由工人直接選出。候選人有時毛遂自薦，甚至使用競選方法。企業中職工代表大會的建立標誌着工人在企業決策中作用的加強。在這個層面上，工人會有相當的積極性參與決策，因爲他們知道，“積極的參與會有效地影響政策的制定。”⁷²

在地方一級，自下而上的參與是一種半直接的方式。例如，省一級人大代表和黨代會代表是通過秘密投票從下面選

出來的。雖然候選人名單還要由上而審定，但候選人數可以多于當選人（差額制），投票人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自由，候選人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競爭。此外，企業為了表達自身利益，常常通過越級上報的形式來解決問題，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對這種參與形式的報導。⁷¹

國家一級單位的參與被限制在機構範圍之內。雖然在人大和黨代會代表的選舉中仍採用差額選舉制，但候選人的提名常常是根據上面提出的具體標準來進行的，例如年齡、性別、職位、民族、黨派等等。政協委員通常由中央指定，一般是高級知識份子和社會知名人士。雖然一些全國性單位代表了不同的社會利益（例如人大、政協、作協），但這些單位對政策問題的態度在多數情況下受上面支配，而不是反映下面的願望。至於地方一級通過何種渠道在全國性單位中表達自己的意見，由於材料的限制，本文暫時無法討論。

中央單位對權力核心的影響進一步減弱。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只是一個形式。名義上，全國性單位（例如全國人大）的職能是監督、提議和參謀。但他們在重大政策問題上既無決定權又無否決權。儘管如此，這些單位的職能近年來趨於正規化和機構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加強了，政協成功地推延了三峽水利工程計劃。雖然新聞仍然受黨控制，⁷² 作協在創作自由問題上仍取得了一些獨立性。因此，中央單位的政治參與形式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杰瑞·候佛（Jerry Hough）所謂“機構多元主義”（Institutional Pluralism）或“官僚參與”（Participatory）⁷³ 及杭廷頓所說的“參與政體”（Participatory Polity）。⁷⁴ 有意見可以表達，但不能超越官方所劃定的界線。“不管是誰，其地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如果違犯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就要受到黨紀處分。”⁷⁵

總之，政治控制自上而下趨於放鬆。企業中可以允許某種形式的直接參與，但越往上走越趨向於機構化。問題是如何在控制和參與之間建立起一種平衡。而這個平衡又取決於另一個平衡的建立，即平等與效率之間的平衡。平等基於一個中央計劃和統籌分配的經濟體制。而這個體制又導致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個人自由受到限制，利益團體的參與受到壓制。⁷⁶ 另一方面，提高效率則要求權力下放，提高職工的積極性及發揮個人的潛力。這又造成不平等和社會矛盾的複雜化。具有不同利益的個人與團體為使政策有利於自己的利益，會要求更多地參與決策。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政治參與的性質與程度取決於整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承擔經濟增長與分化所帶來的後果。

沒有結論的結論

有人可能想知道結論是什麼，遺憾的是，這是一篇沒有結論的文章。目前，一些學者，特別是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學者持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中國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本文的目的是力求客觀地說明過去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和當前經濟改革中所取得的成績及付出或將要付出的代價，而不是要說明一種制度比另一種優越。

在激進的年代中，中國在物質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決了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在平均主義政策的基

礎上，政治領導人能夠動員起大多數群眾，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群眾性政治運動成為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有效工具。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中，權力分散了，個人自由增加了，利益多樣化了，貧富不均的程度也擴大了。在單一的政治口號或政策下動員群眾變得越來越困難。政治控制和參與的形式變得更加複雜和多樣化。行政控制與市場控制相結合，機構化參與和民主參與相結合，決策的不同層面上，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控制和參與。

中國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在物質平等與經濟效率之間，以及政治控制與民主參與之間做出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選擇。在改革中，經濟增長和改進效率要求權力下放，并使民主參與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以前在平均主義政策下對經濟條件差的個人和團體的保護正在逐漸消失（至少是部分地），物質不平等變得更加明顯，從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而且改革所面臨的是一個管轄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龐大的中央計劃機器，以及與傳統的平均主義觀念交織在一起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說到底，平等與效率的選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控制和民主參與的選擇，是一個價值觀念意義上的選擇，而不是學術或科學意義上的選擇。自從海牙克（Hayek）和舒豪伯特以來，人們對現代社會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劣就爭論不休。但至今為止，沒有誰能證明哪一個全對或哪一個全錯。

原文方：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注釋：

1. Korzec & Whyte, "The Chinese Wage System," 1981:257.
2. Whyte &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4:44, Table 4.
3. Parish, "Egalitarianism in China," 1981:72.
4. Whyte & Parish, 1984:60, Table 6.
5. Whyte & Parish, 1984:48, Figure 1.
6.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1977:274.
7. Walder, "Some Ironies of the Maoist Legacy in Industry," 1980:10. 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七年的兩次工資調整主要是按工齡調的，而且只限於給低工資工人調。由於這種平均主義的政策，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並沒有因此而增加，見 Parish, "The View from the Factory," 1979:187.
8. Sen, "Rational Fools," 1977:332-333.
9. L.B. Lav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1962.
10.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十六～十七。
11. USDA, 1985:201.
12. Johnson, "The Agricultures of the USSR and China," 1985:19.
13. 在消費者主權的制度下，市場指導生產，在計劃者主權的體制中，生產由計劃者決定，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1977:99.
14.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1975:2.
15. Li, "Economic Reform Brings Better Life," 1985:15.
16.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十六。
17.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111-82。
18. 注意，這裏所說的國民收入不是按照西方通常的定義，而只是指物質產品的總和，服務業、教育、國家行政管理等都未算在內，如果把這些項目算進去，表三中各國的數字都會下降，見《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六五九。
19.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九：一。

20.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三，十三：四。
21.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七，廿五：一。
22. 《中國青年報》，一九八六，八，十九：一。
董大林，“股份化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新基礎”，《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八，十八：二。
24. 萬里，“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八，十五：一。
25.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十八。
26. 《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五六一~二，五七〇~二；Li, 一九八五：十七。
27. 在一九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又有人重提“大公無私”的口號，這個口號實際上是不承認個人利益的合法性。
28. 《中國經濟年鑑，一九八五》：111-84-85。
29.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五，廿三：二。
30. Okun, 1975:51.
31. Li, 1985:22. 但是，這些統計數字不能與大多數其它國家的數字相比，其它國家的數字都是按家庭，而不是按個人計算的。因此，中國的數字所顯示的平等程度會比其它國家高。
32. Li, 1985:22.
33. Marc Bleche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mall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1976.
34. World Bank,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1985:30.
35. Tan, "Reform Brings New Life," 1986:11-12.
36.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八，十：一。這些數字不包括國家補貼。幹部和知識份子近幾年來在住房方面的改善可能比其它行業快。但是，很難說幹部和知識份子住房的改善是否超過國家對國營企業職工補貼的大幅度增加。劉心武在他的“公共汽車味嘆調”中，對國家對城市不同行業的補貼及城市改革的複雜性做了生動的描述。請參閱劉心武，“公共汽車味嘆調”，《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號。
37. 對教育改革的評價，再一次取決於如何看待平等的問題。理論上，機會平等導致結果的不平等。過去，吃大鍋飯的政策使人很少有進取的機會。現在，由於強調考試和能力，上好學校，找好工作的機會實際上對每個人來說更平等了。但是，由於平均主義的長期影響，人們並不視機會平等為真正的平等，有些人甚至認為，分配的不平等是由於機會不平等造成的。例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一份調查表明，對收入不平等加劇表示不滿的同時，百分之五十一點八的城市居民認為經濟改革並沒有給每個人帶來同樣平等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十九點三的人認為改革為每個人帶來同樣的機會。百分之七十七點三的人寧願要一種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哪怕增加收入的機會減少。參閱楊冠三，“進一步改革的要求和阻力”，《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八，廿三：二。
38. World Bank,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1985:31, Figure 1.4.
39. Townsend &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 1986:363.
40. 農村改革的成就遠比城市改革顯著得多。城市改革的問題與困難比農村多得多，改革是否能進行下去，進行到什麼程度，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41. Kornai, "The Dilemma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1979:9.
42.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88.
43.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1959:145.
44. Mao,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1962:12.
45. Huntington, *No Easy Choice*, 1976:25.
46.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76:302.
47. Townsend & Womack, *Politics in China*, 1986:416-417.
48. 這些問題出現的部分原因是稅收制度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多數賺錢多的行業都徵稅不足，至少是只被政府徵稅，而未被地方（例如所在村子）徵稅，政府只是限於鼓勵富起來的農民出於道德、良心支持本地各項事業，而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稅收制度，如果萬元戶對地方學校、醫療、五保戶基金等不繳納應有的資金，群眾對這些人的嫉妒在某種程度上是正常的。
49. 例如，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國營企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一〇二點五元，而行政幹部的工資只有九七元。《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八，十：一。儘管補貼未算在內，工人與幹部之間的淨差別足以在後者中產生不滿。
50. 見前，註37。
51.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15.
52.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七，廿六：一；八，十四：一。
53.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五，廿七：一。
54.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1983:225.
55. Zhao,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1984:751-2.
56. Lars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1977:51.
57. *Ibid.*
58. Lane,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1985:179, 183, Tables 5.7 & 5.8.
59. Huntington, *No Easy Choice*, 1976:24.
60. 參見《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五九七—五九九，及《中國新聞年鑑，一九八五》：三五—。
61. Womack,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 1984:426.
62. 《文摘報》，一九八六，五，十一：三。
63.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七，三十：一。
64.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十一，二：二。
65.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1975:10-16.
66. Downs, *Inside Bureaucracy*, 1967:57-58.
67. Aaron Wildavsky, 在對美國預算決策過程的討論中對此做了很好的解釋，參閱 *The Politics of Budgetary Process*, 1964.
68. Crozier,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1967:193.
69. Group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Structures, "On the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1985:26-27.
70.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四，十五：三。
71.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15.
72.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1983:226.
73.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五，三十：一。
74. *China Daily*, Jan. 11, 1985:4.
75. Hough 認為蘇聯決策過程的特點是利益的多樣化，決策者之間的談判與結盟，專家對決策影響的加強，政策的漸進性（而不是突變性），以及政治領導人做為協調人作用的加強。參閱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1977:21-23. 從這個意義上講，黨在決策中成為一非主要的機構，功能是調解政府與非政府及政府之內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見 Lane,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1985:160-169, 230-233. 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只有在官方限定的範圍內的參與是被允許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仍被嚴格禁止。
76. 在參與政體中，雖然民眾的參與程度很高，但這種參與是在政治權力的組織和架構下實現的，每一個社會團體必須把它的政治力量 and 行動方式（例如人力、財力、知識，或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在政治制度中轉化為合法的、機構化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並不意味着他們對政府的控制。見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88-89.
77. 《人民日報》，一九八七，一，十五：一。